

主編

張大可

丁德科

【第三卷】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主編

張大可

丁德科

【第三卷】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1—20 卷）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张大可	丁德科	
编	委	赵生群	张新科	张 强
		俞樟华	田志勇	陈 曦
		凌朝栋	王亚玲	王炳社
		曹 强	梁建邦	马雅琴

主创作者（主编以下按丛书卷次为序）

张大可	丁德科	韩兆琦
宋嗣廉	梁燕玲	凌朝栋
曹 强	梁建邦	王亚玲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王明信	可永雪	阎崇东
俞樟华	赵生群	韦爱萍
张玉春	应三玉	张新科
王晓红	王麦巧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许盘清

参编作者与收录作者详各分卷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 (1—20 卷)

丛书目录

- 第一卷 司马迁评传 张大可 著
- 第二卷 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 韩兆琦 张大可 宋嗣廉
梁燕玲 编著
- 第三卷 史记学概要 张大可 凌朝栋 曹 强 著
- 第四卷 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 张大可 梁建邦 著
- 第五卷 史记精言妙语 张大可 辑释
- 第六卷 史记集评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汇辑
- 第七卷 史记人物与事件 王明信 可永雪 编著
- 第八卷 史记史学研究 阎崇东 著
- 第九卷 史记文学研究 可永雪 著
- 第十卷 司马迁思想研究 王明信 俞樟华 著
- 第十一卷 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张大可 赵生群 等著
- 第十二卷 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 张玉春 应三玉 著
- 第十三卷 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 张新科 俞樟华 等著
- 第十四卷 史记疑案研究 王晓红 王麦巧 选编
- 第十五卷 历代史记论文粹编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选编
- 第十六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上)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七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下)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八卷 从《老子》到《史记》一统思想论稿 丁德科 著
- 第十九卷 史记地名汇释表 许盘清 编著
- 第二十卷 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 张大可 俞樟华 梁建邦 编

渭南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史记论著集成（全二十卷）

· 第三卷 ·

史记学概要

张大可 凌朝栋 曹 强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史记论著集成》第三卷《史记学概要》。全书十章，对司马迁其人及《史记》其书，做了系统评价，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内容做了深入的探讨与评析；对《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的流传与“史记学”的形成与发展勾勒了承传路径；对《史记》的语言成就，《史记》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做了简洁明快的评析。本书首次对“史记学”框架进行了试探，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思路，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论著，既可供作教材，也可供《史记》爱好者阅读。中国史记研究会从2001年成立以来，先后推出《史记教程》、《史记通论》、《司马迁与史记学》等论著，有二十余位作者协作，分见于各书。本书是综合三书内容而成，可以说是集多位学者研究成果于一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此说明。

作 者 简 介

本书主创作者是张大可、凌朝栋、曹强。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著有《史记》论著多部。凌朝栋，文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出版学术论著《文苑英华》，参编《史记教程》等书，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曹强，文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渭南师范学院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副院长、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出版学术论著《江有浩〈诗经韵读〉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目 录

第一章 司马迁——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巨人	1
一、大一统时代	1
二、司马迁的家世	6
三、司马迁事历	14
四、历史呼唤巨人降世	24
第二章 《史记》的创作宗旨	32
一、继《春秋》创一代大典	33
二、究天人之际	41
三、通古今之变	43
四、成一家之言	46
第三章 《史记》体制	52
一、百科全书	53
二、五体结构	60
三、《史记》百三十篇标题	71
四、互见法	80
第四章 创立纪传体通史	86
一、纪传体的特点	87
二、通变的历史内容	91
三、《史记》断限	98
四、司马迁的历史观	105
五、《史记》与中国史学	113

第五章 创立传记文学	129
一、《史记》文学性的界说与人物传记特点	129
二、《史记》的抒情性与悲剧性	142
三、《史记》的写人艺术	151
四、司马迁的文学观	165
五、《史记》与中国文学	172
第六章 《史记》的语言成就	183
一、典范的叙事散文语言	183
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192
三、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与提炼	201
四、各色语言的技巧	206
五、讽刺艺术	218
六、雄健、峻洁、婉曲的语言风格	225
第七章 《史记》对先秦文化的继承与总结	234
一、《史记》与先秦诸史	234
二、《史记》与先秦诸子	250
三、《史记》与《诗经》	267
四、《史记》与《楚辞》	275
五、继承与总结前代历史文化的方法与原则	283
第八章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292
一、《史记》与《汉书》	292
二、《史记》与《新五代史》	300
三、《史记》与我国传记文学	318
四、《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326
第九章 史记学的形成与发展	345
一、历代的《史记》研究与“史记学”的发展	345
二、台湾地区的《史记》研究	362

三、《史记》在海外的流传	366
四、《史记》版本	373
第十章 《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390
一、《史记》的民族凝聚力	391
二、《史记》研究成果回顾	396
三、当代《史记》研究的特点	400
四、当代《史记》研究的发展趋势	403
附 录	407
一、《史记》研究论著索引	407
二、本书撰写主要参考书目	424

第一章 司马迁——大一统 时代的文化巨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

1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翔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芝川镇）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 年），卒于昭帝之初（前 86 年？），享年约六十岁^①。司马迁的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正值西汉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制确立以后的第一个盛世，真正的大一统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司马迁降生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正是应运而生。司马迁是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巨人；《史记》的产生，是时代的呼唤。

一、大一统时代

西汉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西

^① 司马迁的生卒年，学术界争论很大，计有五六种说法，迄今无定论。我们经过细密的综合考察，认为王国维立论持之有据，此基本从王说。

汉初建时，社会经济凋敝，国穷民贫，“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①，汉初的统治者为了赢得农民的拥护和重建地主经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巩固了统治地位。经过高、惠、文、景四代的经营，到司马迁成长的汉武帝初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②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③ 全国兴起了几十个大都会。随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繁荣起来。汉武帝即位，锐意兴革。对外用兵，抗匈拓土；对内兴作，多所建树。他访求和超拔人才，“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④，造成了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极盛。西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涌现了出来，形成“历史上一个非常灿烂的时期”^⑤。这一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就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历史背景。

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⑥ 三者之中，“尊汉”实为《史记》撰述之大旨。所谓“尊汉”，就是宣扬汉家一统带来的天下大治。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在汉武帝手里才巩固下来，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为它大喊大叫。这一点司马迁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

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页。

⑥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

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桀。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①

可是在秦汉之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②。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司马迁看到了历史走向一统的方向。他为了探索这一历史的发展原因，追溯到了古代，写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历史书。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③所谓“空言”，指的是理论说教，例如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就是思辨哲学；“见之于行事”，指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史学。在西汉初年，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是一个具有紧迫感的现实问题。贾谊的《过秦》、贾山的《至言》等政论就具有做历史总结的性质。贯穿于《史记》全书的精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本是儒家学派宣扬的王天下的理论。但是，司马迁通过生动的历史叙述来说明这条真理，完满地回答了为什么秦亡汉兴的复杂历史。司马迁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④，但是对秦朝的暴虐统治却做了无情的批判，所谓“抑秦”者指此。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这说明司马迁是自觉地认识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总结历史的。

司马迁尊汉是讴歌大一统盛世。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就经历着由统一到统一的悠久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这是由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华大地，在亚洲东南部，现今国土 960 万平方公里，形如雄

①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④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鸡，在秦汉大一统时已基本确立。其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形成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复杂地形，高原、盆地、平原、大山大川，构成许多独立的地理单元，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吸纳性和开放性。从总体看，中华大地又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因素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经考古发现，中华大地有四大新石器文化区：中原黄河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北方燕辽文化区。兴起于陕甘黄土高原的伏羲族、炎帝族、黄帝族，先后向东进入黄河中游华北平原，进行农业耕作，生息繁衍，统一吸纳四方部族，孕育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中原华夏族的主体地位，历夏商周的承传而确立。西周一统，已经萌芽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方民族泛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夏民族共认一个祖先，这成为中华民族起源的历史传统。伏羲，传说的三皇之一，龙图腾，其形为人首蛇身。所以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黄帝统一中原各部族，草创国家，炎帝教民务农。所以华夏农耕民族都奉黄帝、炎帝为共同祖先，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随着民族的融合进程，华夏周边各民族也自称“黄帝子孙”。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大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产生了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高峰，百家争鸣，儒家文化精细而先进，发展迅速。秦汉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汉族共同体形成，汉文化中的儒学独尊，从此，儒家学说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

黄帝草创国家，统一纷争各部族，创立了中华文明开篇的统一格局。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高度文明的大一统格局。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述三千年历史，从黄帝到汉武帝，正寓意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从统一到大一统的历程。所谓大一统，不仅地域广大，而且是多元民族融为一体。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瞩目，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及无数经学家、思想家的努力，提炼升华为大一统历史观，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前文已及，西周统一已萌芽了大一统观念，到春秋战国经过儒家的大力

倡导而成为普遍的民族心理观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整个国家要置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结束春秋战国的纷争。孔子曾大力称赞齐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述《春秋》以当一王之法，就是力图用载述历史的“微言大义”来阐明自己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开卷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孔子撰《春秋》是写鲁国史，起于鲁隐公元年，而用历却是周历纪年，所以说“王正月”，以此维护周王室的天下共主地位。《春秋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孟子到梁国，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天下一统就安定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天下混乱，兵连祸结，人民渴望统一，诸子百家学说都是主张天下定于一，只是各自方式不同。法家主张“以战去战”，用暴力统一，儒家主张施行“仁政”统一。孔孟奔走呼号，“仁政”统一的路线四处碰壁，秦朝统一是法家路线的胜利，但秦朝二世而亡，又给思想家提出了新课题，怎样才能长治久安呢？司马迁用总结历史来回答，他首次完成了大一统历史观的构建，如前所述，记载历史发展上起黄帝，下迄汉武，用以象征历史从统一到统一的发展。孔子删书，《尚书》起于尧，《周易》起于庖羲，而《史记》起于黄帝。在司马迁笔下，黄帝之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部落战乱之世。黄帝屠灭炎帝、蚩尤，才统一了社会。夏商周三代之后，历史又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长期战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秦朝施暴政，二世而亡，司马迁做了批判，但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又离不开暴力。司马迁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吸收了儒法两家之长，反对施暴于人民，而赞成用暴力定天下于一。《太史公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就是司马迁的暴力论。《史记》肯定秦皇、汉武大一统的功业，记事起于黄帝，也是肯定黄帝的统一功业。一言以蔽之：《史记》起于黄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

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

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贯穿《史记》全书。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是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句践乃禹之后，楚是颡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具有无限的号召力。被黄帝战败的炎帝，教民耕农，号“神农氏”，也是一个企图统一天下的人物，常与黄帝并称。所以“黄帝子孙”这一口号也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到了紧要关头，只要提起“炎黄子孙”这一口号，就能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缅怀激情，追念先祖，认同文化，历史悠远，产生自豪感和爱国心，奋而思进，不畏艰难险阻，贡献一份儿女情，做出个人的贡献。因为“炎黄子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蕴含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是司马迁浓缩的大一统历史观，它是一种民族精神，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这一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晶，也是秦汉大一统时代精神的象征，它的总结与提出，也正是大一统时代的标志。

二、司马迁的家世

司马迁追叙先世，祖源久远，为传说的颡顼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之后。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世代代职掌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代有个封于程的伯爵名叫休甫的人，做了司马这个官，从此程伯休甫这一支便姓司马氏。司马氏在周宣王时重掌史职，世守其业，到东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各个地方，战国时出了不少的名人。司马迁祖上这一支，公元前 621 年因晋室内乱而奔秦，迁居少梁。少梁，即今陕

西韩城。古梁国，附属于晋，在公元前 641 年为秦穆公所灭。秦惠王十一年（前 327 年）改名夏阳，隋以后更名韩城。1985 年，韩城县改市。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河津县北，西段在陕西韩城县北约五十里。黄河穿越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①。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越龙门，跳上去的就成龙升天。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了神圣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所以司马迁引龙门以重桑梓，自称生于龙门。司马迁的实际生地韩城市南二十里的高门原。司马迁自述他的六世祖司马靳葬华池，四世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父司马喜皆葬高门。华池离高门三里。高门东南有芝川镇，镇西相邻有司马坡，司马迁葬于司马坡，今存有司马迁祠墓。至于“耕牧河山之阳”，更不能按字面理解，认为司马迁从小过着耕牧的生活。司马迁祖上颇有产业，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时为五大夫。五大夫为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司马喜无功勋显绩，在文帝时得五大夫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家庭收入。所以“耕牧河山之阳”，指的是司马迁在乡间度过了他的美好童年。这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意识地把司马迁留在乡下龙门接受山川的陶冶，培养他具有开阔的胸怀和热爱山川的感情，为他的二十壮游打下思想感情的基础。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虽然太史令厕于下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等，但司马谈十分珍惜这一职掌，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司马谈重视这一职掌，为的是完成他的修史理想，所以遗命司马迁必为太史。司马谈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辉家谱来教育司

^① 乾隆《韩城县志》卷一。

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了。司马谈出仕在京师，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少年时期未在父亲身边而能“十岁诵古文”，由此可见司马氏之家规家教的谨严。当青年司马迁来到父亲身边，成为他的修史助手的时候，老人的思想品格和学问给予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元朔二年（前127年），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货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到茂陵，属籍显武里。司马迁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生年不详。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时代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官是天文学，由于古人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赋以君臣、尊卑、百官之称，所以称天文学为天官。唐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史记》卷二十六《历书》说：“至今上即位，招致天下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晚年他还和司马迁、落下闳一起参与了太初历的改制工作，也是司马迁的师长。《易》讲阴阳吉凶，杨何是汉初著名的《易》学专家，字叔元，菑川（今山东寿光市）人，在《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中均有传。司马谈学天官和《易》，这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这些知识又传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对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十分精通。道论是文景时代的官方哲学。黄子就是景帝时的博士黄生，他曾在汉景帝面前与儒生《诗》博士辕固生展开了一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意在禁绝一切臣民暴动，维护汉家政权。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是为刘邦取得天下而辩护。所以文景时期的儒道之争并非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之争，而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思想派别之争。汉武帝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思想相对立，也是这样的。《论六家要指》十分推尊道论，表现了成长于文景时代的司马谈所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司马谈是一个道家的信徒。效《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司马谈的理想。他还